两会

中国科学报
CHINA SCIENCE DAILY

主办：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　扫二维码 看科学网　扫二维码 医问医答

总第 7002 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84　邮发代号：1－82

2018 年 3 月 16 日　星期五　今日 8 版

官方微博 新浪：http://weibo.com/kexuebao　腾讯：http://t.qq.com/kexueshibao-2008　www.sciencenet.cn

会说中国

开放中国擘画“一带一路”

■本报记者 陈欢欢 丁佳 王佳雯

3 月 13 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其中，提出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用以加强对外援助、共建“一带一路”等。

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也表明，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将进一步扩大，实施“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放”一系列举措，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副主任刘从强认为，在此背景下，我国“一带一路”科技合作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科技合作成效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目前已得到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一张名片。

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已有 200 余名亚非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技术培训超过 5000 人；与沿线国家共建了一批联合实验室或联合研究中心，未来 5 年将投入运行 50 家；与多个国家签署了合作科技园区协议；建设了一系列区域和双边技术转移中心及创新合作中心。

为了建设这条科技创新的丝路，2016 年 9 月，科技部等多部委联合发布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提出用 10 年左右时间，形成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人才的良好环境，搭建长期稳定的科技创新合作平台。

在实施“丝绸之路”留学和教育方面，据统计，2016 年我国共选拔 226 名国别区域研究人才赴 34 个国家培训进修；“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每年提供不少于 3000 个名额；经审批的各类“丝绸之路”中外合作办学超过 2500 个。

“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多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相对落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谢鹏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加大脱贫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力度。他表示，我国有丰富的防灾减灾经验，并在乡村发展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如能帮助沿线国家解决民生和发展问题，必将提高对中国的认同度，同时也为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发展目标，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成为丝路先行者

中国科学院作为科技国家队，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科技外交和对外开放大局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正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所说：“充分发挥在国际科技合作上的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科技内涵，提供科技保障和支撑服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2 年 9 月，白春礼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长，成为中科院先期布局“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的重要契机。2013 年启动实施的“发展中国家科教合作拓展工程”经过数年发展，许多前瞻性布局的成果已开始显现。

例如，依托加德满都联合科教中心，中科院与多国合作对“第三极”环境变化开展长期动态监测研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极环境国际计划（TPE）”发起人姚檀栋获得 2017 年维加奖，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该奖。

此外，中国科学院还有很多优势科技成果正在“一带一路”沿线应用示范和转移转化。例如，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和柬埔寨吴哥窟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局合作，利用我国卫星和航空遥感技术监测吴哥窟周边环境、加强保护。这一研究属于“数字丝路（DBAR）”国际科学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 2016 年 5 月由中国科学家倡议发起，旨在利用地球大数据提高生态环境监测能力，支持“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DBAR 计划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科技合作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为这些国家面对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提供多样化的解决方案。为缩小“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鸿沟，DBAR 计划将与参与国家和地区互利共赢、应对挑战。

探索合作长效机制

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化建设是当务之急。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一带一路”建设从双边上升到多边层面，进一步凸显出机制建设的迫切。

2016 年，中科院启动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行动”，重点开展战略咨询、人才培养与成果转化等方面工作，争取用 5 年时间形成国际大联通的科技合作网络雏形。同年 11 月，20 多个国家科研机构领导在京签署发布《北京宣言》，成立“一带一路”科技组织联盟，进一步探索合作的长效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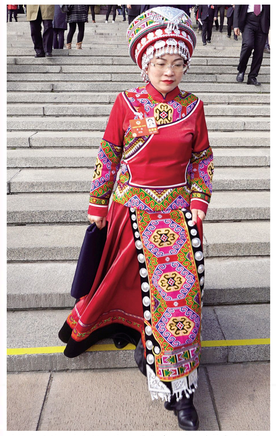
在白春礼看来，以科技合作为先导，通过知识界和科学界的有效沟通带动起各阶层、全社会的“民心相通”，能够为共建“一带一路”夯实民意基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在积极探索“一带一路”科技合作资助机制。多年来，基金委不断拓展与“一带一路”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实质性合作，目前合作协议数达 21 个，占总合作协议数的 23%。

2017 年 7 月，基金委联合 30 多个国际科研资助机构的代表通过了《支持科学人才合作，共创“一带一路”未来联合宣言》，推动沿线国家科技合作网络建设，首要任务就是机制建设。

刘从强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当前“一带一路”国家无论科技水平、社会经济发展还是人才队伍都各不相同，合作的前提首先是达成共识，并建立科学有效的合作机制和模式，只有多国统一协调、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系统合作研究，才能解决共同面临的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明年春天再相会


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3 月 15 日闭幕。图为委员步出会场。　本报记者丁佳摄

委员依依惜别。　本报记者丁佳摄

委员走出会场。　本报记者陆琦摄

委员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陆琦摄

委员握手告别。　本报记者丁佳摄

集思广议

韩恩厚代表

将东北亚科技创新中心纳入国家战略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近年来，沈阳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为载体，结合北大且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自贸区建设与东北振兴等举措，打造“先进材料+智能制造”为重点的东北亚科技创新中心，把科研、教育、企业有机融合，把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机结合，带动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创新强由国家主体投入，产业链由地方主体投入。”日前，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沈阳分院院长韩恩厚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东北亚科技创新中心将打造以北沈阳为核心，联合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地的科技高地，支撑东北长远发展和辐射东北亚的战略力量。

对此，韩恩厚希望国家相关部委组织论证，尽快将东北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正式纳入国家战略，给予政策扶持，比如，支持沈阳以“先进材料+智能制造”为特色的莫子山实验室建设，以此为基础打造以沈阳为核心的先进材料与制造国家实验室；支持大连建设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

韩恩厚还呼吁相关部门在辽宁部署系列大科学装置和科研机构，比如，支持沈阳建设高度集聚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支持大连建设高重复频率极紫外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支持沈阳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董明珠代表

建议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本报讯（记者李晨）近日，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应加强商业秘密保护，以保护创新者合法权益。

董明珠告诉记者，格力电器平均要花 5 到 10 年才能培养一名优秀研发人员，研发经费不设上限。但近几年，格力电器辛苦培养的员工经常被大型企业恶意挖走。人员非正常流失，使原本大量投入人力物力研究而获得的技术秘密和成果被泄露，格力产品新上市不久，竞争对手马上推出了相似的产品。这严重影响了格力电器的创新速度、正常经营和市场竞争。

目前，国家虽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法》《刑法》中规定了商业秘密保护的条款，但是内容相对散乱且难以操作，同时存在多头执法的情况。

为此，董明珠建议，完善《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对商业秘密的规定，明确规定商业秘密保护的内容范围、保密的时间限制和保密的责任；设立商业秘密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除了侵权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给予受害人明确的补偿以外，侵权人还需要向受害人支付 3 到 5 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将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由 50 万元的直接损失，调整为 10 万元的直接损失或者间接损失。

韩峰代表

新旧动能转换要“求新利旧”

本报讯（记者计红梅）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齐鲁石化分公司总经理韩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新旧动能转换，不能一味地“求新”，简单地“废旧”，而应全国、全产业“一盘棋”，加强顶层设计，既要着力“求新”，使新兴产业做强，又要统筹“利旧”，把传统产业做优，通过做强新兴产业、做优传统产业，实现现代产业的做大，从而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在当前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部分地方、部分行业因为缺少顶层设计、统一规划，重复铺设新摊子，加剧产能过剩，导致“上产能”后再“去产能”的怪圈不断重复。

韩峰建议，一方面应布局“新滩点”，把新兴产业做强。应坚持“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思路，通过利用新技术、采用新工艺、生产新产品、打造新产业等，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另一方面，应优化“旧资源”，把传统产业做优。在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应充分论证、充分依托存量工业园区，通过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来优化“旧资源”，防止重复建设新上“旧项目”。用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加剧产能过剩。

黄河代表

用信息化手段治理成品油税收流失

本报讯（记者计红梅）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总经理黄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市场上还是有一些企业针对我国“以票管税”征管方式的特点，采取销售不开发票、变更品名开票，或以生僻物料、化工产品以及暂缓征税产品的名义开票，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他建议，采用大数据甄别等信息化手段，织密监管网络，堵塞税收漏洞，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黄河表示，要研究制定“互联网＋税收”征管办法，依法要求成品油生产和经销企业的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数据实现“三流合一”，并与税务监管部门实现实时互联互通。同时，用大数据的理念核查纳税人的经营规模与纳税水平的差异，加强对加油机主板等数据进行抽查，建立自动甄别疑点发票和疑点企业的机制，利用“互联网＋税收”手段编织打击漏税、偷税等违法行为的天网。

“汽油要重点加强加油站销售环节的税收管控，柴油要重点加大对‘自流黑’（自建罐、流动加油车、黑窝点）的打击力度，坚决堵塞体系外不开票的逃税行为。”黄河说。

两会时评

用好人才这个最大“富矿”

■李晨阳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力人才资源，这是创新发展的最大‘富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人才富矿”的论述，铿地有声。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正在向着世界前列人才强国迈进。随着个人爱报交办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真正利国利民的“人才红利”才刚刚展现出巨大的潜能。

既然人才是一座宝矿，就要一手开采，一手护养。就像煤矿和石油都是大自然亿万年的积淀，人才富矿的积聚也需要数代人的努力。用好人才这个最大“富矿”，一言以蔽之，就是优质育人、放手用人、诚意留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人才、培养人才是永恒的话题。历经 30 余年的倡导和弘扬，“素质教育”的概念深入人心，其内涵也在不断拓展。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思维方式、创新意识、思想理念的启发和培养。近年来科学教育大力推进，科教融合迈猛发展，正是新型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探索前行的表现，假以时日，必将培养出更多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养“智”更须养“心”。曾见某教育培训机构的广告：“来富苦读助您一飞冲天，金榜题名免您半世奔劳”，从中可以一窥当下颇具代表性的社会价值观。在不少人眼里，刻苦读书的意义仍是在考试中脱颖而出，而赢得考试的目的则在于换起钱饭碗。如果一个国家最聪慧、最具学习能力的年轻人都去追求稳定清闲高收入的工作，这无疑是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要扭转这种局面，仍需要建立正确的社会、学校和家庭的价值引导。

人才是“养”出来的，更是“用”出来的。从学术机构到工作单位，只有不拘一格“用”人才，敢于把有潜力的年轻人安排到重要项目和重要岗位中，让他们在实践中接受磨砺、激发潜力、体会创造的快乐、感受胜利的荣耀，才能让更多人成为栋梁。事业是一所好学校，能让有能力、有智慧、有责任心的人放胆地干起来，能让有能力、有智慧、有责任心的人大显身手，能让有能力、有智慧、有责任心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样的氛围和环境，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成就人才。

人才“富矿”，要的是答案，怕的是流失。教育出了人才，磨练出了人才，还需要思考怎样把这些人才留下来，甚至吸引到更多外来的人才。无论是事业留人、情感留人还是待遇留人，都要让人才体会到归属感、成就感和获得感。落实到具体操作中，就是如人善任、赏才适用，并且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和完善的奖励制度。同时，树立全社会对脑力劳动和创作活动的尊重，建立对知识产权的强力保护，充分激活市场机制，给人才带来更为及时、更为可观的回报。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资源。用好人才这座最大的“富矿”，就是把握了国家崛起的命脉，开启了通往富强的大道。因此，不要吝惜育人、用人、留人的方度。在“人”的问题上，政府、社会、单位、家庭的每一分灌溉，都必将收获更今人惊喜的果实。

两会通道

①3 月 15 日，全国政协委员李彦宏（右）、苏权科（左）、邓中翰（中）在“委员通道”接受采访。
新华社记者张玉薇摄

②3 月 15 日，全国政协委员刘伟、杨卫、李新民、冯健身在“委员通道”接受采访。
本报记者陆琦摄

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闭幕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15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汪洋发表讲话。

3 月 15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京闭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丁林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向宇

重视构建科学体系基础研究

本报讯 （实习生韩扬眉 记者王佳雯）“‘无用之用’的科学研究在构建科学知识体系方面十分关键，只重视‘有用之用’，而无视‘无用之用’，是不可能成为科技强国的。”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周向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在周向宇看来，科学知识体系是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其中“无用之用”科学体系的构建，其本身就是一种“用”。他从科学史的角度分析称，大量的基础科研成果是为构建科学知识体系而生，并非为了立竿见影的实用，但经过较长的时间跨度后，仍被发现应用空间并造福人类。

据悉，今年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要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大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夯实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础。

周向宇也表示，当下社会各界对基础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已有所提升，不过仍有改进空间。他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倡导构建科学知识体系强国，将其明确列为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一项战略目标；再者，提升科学知识体系构建者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此外，加强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做“无用之用”研究很光荣的社会氛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晓风

促进基因编辑作物育种成果转化

本报讯（记者陆琦、李晨阳 实习生韩扬眉）“鉴于基因编辑育种与常规育种、生物技术育种并无实质差异，建议国家尽快建立基因编辑作物品种审批相关的管理条例。”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曹晓风在两会期间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她表示，传统育种方法耗时、费力、不确定因素较多，研发新一代的育种技术是各国农业争夺的制高点。以 CRISPR/Cas 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近年来连续突破，为实现精准、高效、省时、省力和安全的农业育种技术革命提供了新契机。

迄今，以广产品监管”为代表的美国已对基因编辑的高油酸大豆、抗氧化蘑菇、糯玉米等作物下达了转基因监管豁免权。其他传统粮食出口国如阿根廷、巴西、智利等也认同基因定点编辑农产品无须监管，并出台了相关的管理办法。在管理严格的欧洲，瑞典和芬兰也先后表态认同基因编辑植物产品为非转基因产品。

曹晓风表示，我国在国际上较早地启动了基因编辑技术和品种创新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比如，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高彩霞首次在水稻和小麦中建立了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体系，获得了世界上首株基因编辑作物。

“当前我国农作物基因编辑育种研发具有国际领先优势，应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基因编辑作物育种成果的转化。”曹晓风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卫健

积极实施黄土高原治理“26 字建议”

本报讯（记者王佳雯 实习生韩扬眉）“黄土高原地区地貌特征复杂，对于不同的地貌应该进行有针对性地治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卫健说。她建议，应积极实施黄土高原治理的“26 字建议”：“塬区固沟保塬、坡面退耕还林草、沟壑治沟造地、沙区退林还灌草”，并将其提升为黄土高原综合治理方略。

据悉，黄土高原是我国最严重的水土流失与生态环境脆弱区，也是当前国家实施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核心区域之一。周卫健介绍称，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黄土高原治理经历了从以“沟道打坝淤地和坡面梯田建设”为重点的工程治理到以“退耕还林草工程”为主的生物治理的历程，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周卫健指出，通过跟踪研究、调查发现，随着退耕还林草工程的推进，黄土高原不同地貌单元出现了耕地面积不足、局部地区人—粮矛盾突出，坝面破碎化等现象，对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利。

通过考察以及过去数十年治理历程的梳理，周卫健提出，工程治理和生物治理相结合的协同发展是未来黄土高原综合治理的大方向。她还建议将“26 字建议”提升至黄土高原综合治理方略。“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我们从科学的角度进行提升和总结，以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能够科学指导。”她说。

院士代表委员声音

履职故事

全国人大代表霍涛：

在智力扶贫中发挥民企优势

■本报记者 张楠

“‘白山’这个名字是我们几个创始人心中的一种情怀。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永远都是白色的，只有在这样的山上才能俯瞰云层。这是我们赋予白山的意义，也是我们每一位员工的工作愿景。”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白山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霍涛，回想自己的创业历程，感慨道：“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冲动。现在，创业门槛降低，有更多的人有机会去实践这种冲动。很多年轻人刚毕业就燃烧着荷尔蒙加入创业大军。”

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3 月 15 日闭幕。　本报记者丁佳摄

作为一名从业 16 年的互联网老兵，3 年前，霍涛扎根贵州创业，“成为万千‘贵漂’和‘贵创’的一个缩影”。白山是围绕数据提供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大数据在传输、存储、消费、治理环节的全生命周期服务，目前服务于 70%的中国网民和 2 亿多海外用户。

2018 年，霍涛又有了一个新身份：全国人大代表。他坦言：“这是一份政治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从此他应站在更高的层面为国是建言，为民生奔走。

他认为，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中，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风生水起，三大电信运营商等国家级行业级数据中心建成，华为、高通、苹果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在贵州落地发展，一大批高科技中小企业涌现出来，形成聚集效应。

同时，贵州建设了全国首个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指标评估体系，培育建成 10 个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公共服务平台，推进了融合的新跨越。

白山也在生机勃勃的大环境中成长壮大，并且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迎来了新机遇。

然而，在创办之初，白山也曾面临人才难招募、难留住的问题。“随着贵州大数据产业环境和人才扶持体系的完善，切身感受到贵州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创业寻梦、吸引本土人才的回流。”

霍涛以白山举例：“位已经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贵州籍苗族技术骨干，去年举家搬回贵州发展；另一位从硅谷顶尖科技公司归国的工程师，也来到贵州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帮领研发团队发展。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霍涛提出，扶贫必扶智，民营企业应当发挥“智力收割机”的人才聚集作用，依靠技术力量提升脱贫的质量和能力。

而用大数据服务大扶贫，更应当以创新引擎拉动产业，在科技扶贫中发挥民营企业优势。贵州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正处于从以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数据粗加工，到以软件平台为核心的数据深加工战略的转换期。而白山在大扶贫中所作的尝试正是向数据深加工转换的必经之路，用看不见的软件服务，实现看得到的精准扶贫。

今后五年是贵州发展关键的五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霍涛表示：“定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践行产业报国，充分发挥大数据作用，服务好贵州脱贫攻坚。”

记者观会

■本报记者 陆琦

“从北京开车到上海，只要开上高速公路就不用管了，吃着火锅唱着歌……”3 月 15 日，全国政协委员李彦宏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最后一场“委员通道”上称，再有三到五年，在完全开放道路上，替代司机的无人驾驶车就会出现。

在场的记者无不感叹：未来已来。

日前，无人驾驶技术的研发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谷歌、特斯拉、英特尔、腾讯、百度等巨头在这一领域纷纷投入重金。然而，人们对于无人驾驶汽车安全性的担忧却从未消减。

除了担心技术不成熟，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国现行汽车道路管理法规有部分条款不适应无人驾驶汽车发展需要，法制保障力度较弱。

事实上，不少国家已开始无人驾驶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和制定。比如，2017 年 9 月，美国通过了全球首部无人驾驶汽车法案，旨在加速自动驾驶汽车进入市场。截至目前，北京、上海也已经相继出台自动驾驶路测管理办法，允许无人车上路测试。

的确，一项技术在创新的时候绝对可以大胆探索，但是当它投入生产生活的时候，相关的制度保障一定要跟上。尤其像人工智能这种颠覆性技术，一旦深度嵌入社会生活，随之而来的新问题亟待法律法规的及时补充和更新。

未来已来 我们准备好了吗

微眼看会

从科学家“逃离”看人才如何流动

■本报记者 胡珺琦

2 月 23 日，《科学》杂志报道称，民办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预计在今年获得国家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而在今年初，“中科院院士施一公请辞清华副校长一职，全职执掌西湖大学（筹）”的消息就已经在学术圈引起了热议。

有人说，施一公告别体制，无异于“下海”，走上的是一条结果不定的“创业”之路。在强调“产学研用”一体化布局的今天，民营资本激发学术研究机制的革新，是否会刺激更多体制内的科研人才出走？

科学家“兴学”是好事

早在 2015 年，施一公就与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等科学家一起提交了《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建议》，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示。2016 年，这几位科学家正式发起筹建了西湖大学的前身——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他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民办小型研究型大学，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探路。

施一公选择脱离体制施展拳脚，网络舆论评价不一，但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合肥研究院先进制造技术所所长王客川看来，这是开放多元的社会氛围下对个人价值的一种判断和追求，是人才的正常流动。

施一公这位从大三父亲去世时起，就立志要改变社会的科学家，2007 年回国以来一直想要影响一批青年人，想要培养最优秀的创新型青年才俊。“他要把自己的一套教育理念、思想更自由地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王客川认同科学家参与“兴学”这件大事。

“至于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只要他能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创造价值，能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这都不是障碍。”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周忠和说道，“一直以来，我们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投入主要靠国家财政支持，通过知名科学家的流动，能够吸引更多来自体制外机构企业的资金支持，这对完善国家基础研究的投入甚至是体制机制都是一种促进，应该得到鼓励。”

流动的本质是打破一方占有

目前，无论是科研人才还是技术创新人才，大多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对科研人才来说，脱离体制，进入一个有合适发展空间的平台，这样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周忠和认为。

原因就在于，体制内外的机构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和定位差异是明显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孙东明解释，高校、研究所的研究环境相对自由，要求发散性思维，崇尚从无到有的创造；而以企业为主的体制外的机构，以市场为导向，要求技术的提升、创新必须接地气，能解决实际问题，注重效益。

“尤其在国内，拥有强大实力的研发机构并持续投入扩大运行的企业屈指可数，大多数企业更需要的是短平快的创新成果。”在孙东明看来，这样的企业环境还不能吸纳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前瞻性的科学创新。

“现在我们提倡的人才流动的本质是要打破一方占有，消除体制内外的隔膜。”王客川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支持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融通创新。所谓“融通创新”，需要的是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并非科研人员彻底出走。

以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先进制造技术所为例，研究人员在做好国家项目的同时，也积极为产业服务，比如通过帮助它们进行智能化改造，从而提升企业产品的质量、劳动生产效率。再者，为战略新兴产业布点，由研究所和企业共同投资创立公司，各取所长，将成果快速转化。

“前提是，这样的融通必须建立在理念、目标、定位一致的形势下，才能保证合作效率。”王客川补充道。

（下转第 3 版）